

霍夫斯達特(Hofstadter)史學思想的轉變

孫同勳

一九五〇年美國歷史學會召開年會時，會長毛瑞遜(Samuel Eliot Morison)在致辭時告訴與會的人說，他發現自一九四五年以來，美國人對他們的過去都抱持一種友善，甚至喜愛的態度，與二十五年前年輕知識份子所持的那種嘲笑甚至憎恨的態度大不相同。他同時也覺得當時美國的史學研究因過去過份強調自由傳統而變得不平衡不健康，因此他呼籲美國的史家們要從「一個理性保守主義的觀點」去重寫美國歷史。他預言一位強調保守傳統的史家必將獲得令譽與成功。¹但九年之後，漢姆(John Higham)卻已開始抱怨新一代的史學家們對「美國諧和」的崇拜(the cult of American consensus)對美國史學發生不良影響。他指出在一九四〇年代，美國年輕的一代史家們開始批評進步史學(the Progressive history)；到下一個十年這種批評即發展成爲對美國歷史的全新解釋。由於這一解釋特別強調美國傳統的諧和性與不變性，他將其稱之爲「諧和史學」(consensus history)。他說這派史家的主張糾正了進步史學的過

本論文初稿原宣讀於「冷戰時期之美國」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民國八十二年四月十七日）。

作者現任職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通信研究員。

¹ Samuel Eliot Morison, "Faith of a Historia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56(1951), pp.272-273.

份強調對立與衝突，並鼓勵史家們從事原始研究，以期真正了解美國。但是，過份重視諧和卻也使史家們不能正視美國歷史中若干自發自動、激情或暴力因素；也不能嚴肅的處理觀念的衝突。尤其重要的是它也使史家們忽視許多對美國史發生重大影響的道德問題，因而使美國人不能注重社會不公與改革精神。²

從毛瑞遜的呼籲到漢姆的抱怨，可見一九五〇年代美國史學的轉變。轉變的原因兩人都直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流行的保守思潮。事實上，諧和史學的崛起與當時盛行的保守主義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有時也被稱為「新保守史學」(the neo-conservative history)，以別於進步史學崛起以前的舊保守史學。但是因其起源於保守思潮，而將諧和史學等同於保守主義，則亦只見及諧和史學的一面。就其整體觀之，諧和史學的起源、性質、以及持此主張的史家們的理念(ideology)都遠比毛瑞遜與漢姆所了解的為複雜。一九六〇年代中葉，新左派史學崛起，取代了諧和史學的主導地位之後，另一代的史學家們對它進行了全面的省察，因而獲得更完整的了解。

在一九七三年與一九七五年，威斯(Gene Wise)與斯托薛爾(Bernard Sternsher)分別出版了他們對二十世紀美國史學的研究，而諧和史學佔了他們研究的大部份。他們可算是從美國二十世紀史學整體觀點對諧和史學所作最完整的研究。他們兩人都認為強調諧和與延續(consensus and continuity)只不過是一九五〇年代美國史學的一個面相，不足以概括全體。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崛起的新史學與進步史學處處針鋒相對，威斯因此將其稱為「反進步史學」(the counter-Progressive history)³而捨「諧和史學」不用。

² John Higham, "The Cult of the 'American Consensus': Homogenizing Our History," 原發表在 *Commentary*, XXVII (February 1959), pp. 93-100, 後收在 A. S. Eisenstadt, ed., *The Craft of American History: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1966), I, pp. 193-205.

³ Gene Wise, *American Historical Explanation: A Strategy for Ground Inquiry*, 2nd ed. (Homewood, Ill., 1980).

威斯認為進步史家與反進步史家在造成歷史變遷(historical change)的時機、變遷的性質、以及造成變遷的原因上，都有不同的意見。進步史家特別關心政治與經濟；在解釋變遷的原因時，他們傾向環境論，即強調外在的經濟利益。反進步的史家卻反其道而行，不用環境論來說明人們行為的動機；他們慣於在人們的內心深處(mind and psyches)尋求改變歷史的原動力。他們不關心政治經濟，而從心理學、藝術與哲學獲得啓示。他們注重由象徵(images)、迷思(myths)與符號(symbols)所體現的人們對實狀的認知(peoples' pictures of reality as embodied through images, myths and symbols)。這些認知可能與實際狀況不一樣，但卻會成爲一種心理力量驅策人們行動。所以他們說即使最明顯的錯誤也會促成人們的行為。他們認爲迷思本身即是一種實狀(reality)，不是證明其錯誤，即可將之斥爲不存在的。進步史學家強調行為的經濟動機；而反進步史家則相信人們是受心理因素的驅策而行動：如身份地位(status)的追求或重回樂園的慾望等。在歷史變遷的性質方面，威斯指出對變遷持有一種曖昧感(sense of ambiguity)可能是整個反進步史學的重心所在。進步史學家認爲實狀(reality)是可以直接觀察的；反進步史家則透過分析迷思、符號與像徵而發現歷史中充滿了矛盾(paradox)、反諷(irony)、扭曲(perversity)與曖昧(ambiguity)。他們認爲驅使人們行動的觀念或動機都是隨狀況而異的(situation specific)，而狀況永遠變動不居。進步史學家認爲「壞事來自壞觀念與壞人；好事來自好觀念與好人」。但反進步史家卻發現「好人由於好觀念而作壞事」。觀念既複雜且有力，常同時產生又好又壞的結果。但是，反進步史學家最強調的還是進步的曖昧性(the ambiguity of progress)。進步史學家認爲進步是理性克服惰性的直接勝利。但反進步史家卻相信人們有時「返還好事」(backing forward good things)或「回到他們的未來」(backing into their future)。而且人們實際完成的往往恰好與他們想完成的完全相反。觀念有時會同時指向前也指向後。所有人類的行

爲是好與壞、合理性與不合理性的複雜混合。不像進步史學家採用直線式或二元邏輯（即非此即彼的邏輯）(straight line or either/or logic)，反進步史家們採用辯證的或兩者皆是的邏輯(dialectic or both/and logic)。總之，反進步史家認爲進步不是整體的直線向前，而常含有反動的拉力。反進步的史家也完全捨棄了進步史家將社會區分爲富有與貧窮兩個團體的二分法。威斯指出這是因爲反進步史家在解釋美國歷史時強調統一和諧更甚於對立衝突。反進步史家認爲最基本的「公共實狀」(public reality)是文化而不是階級。前者是一種綜合的力量，而後者則是一種分裂的因素。因此，反進步史學有時也被稱爲「諧和史學」。⁴

以上所言是威斯所學反進步史學的主要特點。但他同時也指出並非所有被認爲是反進步史學的人都持有完全相同的意見或看法。事實上不同的反進步史家在各自強調的重點上往往有差異。譬如，在強調諧和與降低衝突方面就至少有兩派不同的意見。⁵ 有些人傾向迷思與符號的研究，有些則否。⁶ 而斯托薛爾也發現在諧和史家中對理念(ideology)在美國所扮演的角色有兩種相反的看法。⁷ 很顯然的，所謂諧和史學或反進步史學並不是一個具有一致看法或主張的學派。反對進步史學是諧和史家共同一致的，但在主張的細節上卻各有強調重點的不同。那麼，在這個諧和史學的意見光譜上霍夫斯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位置何在？更詳細一點問，他究竟是不是一位諧和史家？如果是，他是一位激進的、自由的或保守的諧和史家？他的立場或觀點是否有所轉變？要想確定他在美國史學史上的地位，這些問題必先解決。

⁴ 此處所言主要是根據 Bernard Sternsher, *Consensus, Conflict and American Historians* (Bloomington, 1975), pp. 1-3, 有關威斯原文的摘要。至於威斯原文見威斯, *American Historical Explanation*, pp. 84-85, 89-93, 100-03。

⁵ Wise, *American Historical Explanation*, pp. 92-93, 343.

⁶ *Ibid.*, p. 102.

⁷ Sternsher, *Consensus, Conflict and American Historians*, p. 4.

從漢姆開始一直到斯托薛爾討論過諧和史學的人大致上都認為霍夫斯達特是一位傾向保守主義的諧和史家。⁸但最近十餘年來有些史學家對霍夫斯達特的史學提出不同的看法。一九八二年美國史學家組織(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的年會中有一個會場(session)特別討論霍夫斯達特的史學。古德威(Lawrence Goodwyn)在宣讀的論文中將霍夫斯達特描寫成最後一位從舊貴族精英主義的立場來捍衛美國獨特性(uniqueness)與進步觀的戰士。但班生(Lee Benson)在評論時卻不同意他的看法。他認為霍夫斯達特是從馬克斯主義的觀點來寫《改革時代》(*The Age of Reform*)的。他雖然強調諧和，卻是從馬克斯主義的批判立場出發的。⁹又如辛格(Daniel Joseph Singal)指出霍夫斯達特的著作與衝突對和諧的爭論只有極為邊緣的關係。尤其是對他早期的論著而言，諧和的標籤最不適合於他。¹⁰貝克(Susan Stout Baker)則指出近來史學家就霍夫斯達特在美國史學史上的定位發生爭論。對這個問題表示過意見的學者大致上認為將霍夫斯達特歸類為保守的諧和史家並不十分恰當；但究竟應如何歸類定位卻又意見分歧。貝克雖然指出徹底解決此一問題的證據尚未大集，目前難作定論；但他卻強調霍夫斯達特年輕時受馬克斯主義的影響甚深，故有「激進的開始」(radical beginning)。在他晚年的研究中雖然較不強調文化的經濟基礎，但

⁸ Higham, "The Cult of the 'American Consensus' . . ." in Eisenstadt, ed., *The Craft of American History* I, 195; Robert Allen Skotheim, ed., *The Historian and the Climate of Opinion* (Reading, Mass., 1969), pp. 80-81;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Richard Hofstadter," in Marcus Cunliffe and Robin W. Winks, eds., *Pastmasters: Some Essays on American Historians* (New York, 1969), p. 789; Wise, *American Historical Explanation*, pp. 102, 343-344; 以及 Sternsher, *Consensus, Conflict, and American Historians*, p. 9.

⁹ Lawrence Goodwyn, "Hicks, Hofstadter and the Continuing Legacy of Consensus," paper given at the Conven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 Philadelphia, April 1, 1982; 以及 Lee Benson, *Commentary*. 轉引自 Susan Stout Baker, *Radical Beginnings: Richard Hofstadter and the 1930s* (Westport, Conn., 1985), p. xvi.

¹⁰ Daniel Joseph Singal, "Beyond Consensus: Richard Hofstadter and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9 (Oct., 1984), 977.

他從馬克斯那裡學來的辯證的論證法卻一直沒有放棄。¹¹ 晚近的這幾位學者雖然不同意將霍夫斯達特分類為保守的諧和史家，但究應如何解釋他的史學思想，他們的意見卻也甚為不同。由此可見，時間上的較長距離不但沒有使學者們對霍夫斯達特的史學達成共識，反而益見分歧。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之一是自一九六〇年中期以後美國的史學思想發生了改變，使史學家們能從新的觀點來看霍夫斯達特。另一個原因則是到目前為止學者們很少就他的一生與全部著作作整體研究。也許是因為霍夫斯達特去世未久，而他的著作又甚多，¹² 所以討論他的學者大都僅以其少數幾種論著為中心來論其史學思想。¹³ 這樣自然就只見一斑，難窺全豹。而霍夫斯達特的研究興趣又時有改變。有的學者甚至以為他從一個題目跳到另一個題目，往往淺嚐輒止，欠缺深度。¹⁴ 這當然也增加了了解其思想的困難。但尤其重要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霍夫斯達特的史學思想經歷了一次重大的轉變。忽略了這一點，就難以確切的掌握他思想的基本要素。

諾伯 (David W. Noble) 曾指出一九四四年出版的《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¹⁵ 還在比爾德 (Charles A. Beard) 的影響下寫成的。但四年之後出版的《美國的政治傳統》(*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¹⁶

¹¹ Baker, *Radical Beginnings*, pp. xiv-xvii, p.242-244.

¹² Hofstadter 共有九本主要專書，另外還有許多單篇論著。到目前為止，似乎尚無人將他的全部作品加以收集與整理。

¹³ 就筆者管見所及，到目前為止討論他較詳的似乎還仍是 Baker, *Radical Beginnings*，但也不是全面的。除了求學時期的習作外，Baker 也只討論了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The Age of Reform*, *Ante-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以及 *The Idea of a Party System*。而有關後三本書的分析也只限於辯證法的使用。本書顯然不是全面的整理研究。

¹⁴ Baker, *Radical Beginnings*, p. 235.

¹⁵ 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1865-1915* (Philadelphia, 1944, 本文所用為1967年的修訂版)。

¹⁶ Richard Hofstadt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New York,

卻已展現了他反進步史學的傾向，並開始強調美國傳統的和諧與不變。細讀這兩本書，證實諾伯是有道理的。以下所論，即是以諾伯的意見為線索，以這兩本書為基礎，分析霍夫斯達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數年之內史學思想的轉變及其原因，以提供一個個案，證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不但美國整個史學界由進步主義轉向保守主義；在這個保守的風潮下，甚至連若干個別的史家個人也有所轉變。

根據貝克的研究，霍夫斯達特在水牛城大學(University of Buffalo)所寫的一篇導修論文(tutorial thesis)以及在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所寫的碩士學位論文都是在比爾德的影響之下，使用他的研究方法寫成的。¹⁷ 當他進入哥倫比亞大學修讀博士學位之後，他一直追隨寇堤(Merle Curti)學習，而寇堤是一位公認的進步史學家。因此，在他修讀博士學位期間所寫的一些報告大致上都強調經濟因素在造成人們行動與思想上的重要性。雖然貝克認為他重視經濟的原創力是受了馬克斯的影響，¹⁸ 但是馬克斯是否是他的唯一啓示來源，頗有商榷餘地。他一度曾是美國共產黨員，但他從不是一個盲目的馬克斯信徒，後來並且因蘇共大整肅，蘇德非侵略條約，以及蘇聯入侵波蘭，對共產黨大感失望而脫黨，甚至想放棄馬克斯主義。¹⁹ 馬克斯究竟給他留下了多大的影響是很難以確定的。但有一點卻是毫無問題的，那就是即令他強調文化與觀念的經濟基礎，但他從未直接採用生產關係、階級鬥爭、或暴力革命等觀念來解釋美國的歷史。在他晚年的論著中，他越來越不重視經濟因素。即在採用辯證法上也難以認定是接受馬克斯的影響，

1948).

¹⁷ Baker, *Radical Beginnings*, pp. 104, 113. 導修論文的名稱是“The Tariff and Homestead Issues in the Republican Campaign of 1860.” 碩士學位論文則是“The Southeastern Cotton Tenants under the AAA, 1933-1935.”

¹⁸ *Ibid.*, chapter 6, “Hammering Out the Ideology of Capitalism,” pp. 115-136.

¹⁹ Hofstadter 與美國共黨的關係可參考 Baker, *Radical Beginnings*.

因為根據威斯的說法，所有反進步史學家都採用辯證的論證法，不獨霍夫斯達特為然。²⁰ 霍夫斯達特自己一度曾說極大多數的進步史學家都忽視馬克斯對資本主義所作的經濟分析，以及他那啓示式的社會預測，但卻都接受他對歷史的取徑(approach to history)。他並且批評將比爾德與馬克斯並列是一種錯誤。²¹ 這話用來描寫他自己與馬克斯主義的關係也同樣的適當。尤其，他自承比爾德對他影響之大，也難以使人同意馬克斯是他的唯一思想源泉。他曾坦白承認在他開始學習歷史之初，他曾深受比爾德及其他進步史學大師的影響。他說：

當我開始具有一些史學者的身份(identity)時，那是這些人，特別是比爾德與派靈頓(Vernon Parrington)的著作引起我的興趣，為我提供了了解美國歷史的指導觀念。和其他許多與我同輩的史家一樣…我因受到比爾德夫婦合著的《美國文明的興起》(*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的啓示才開始研究美國史的。²²

在一次訪問中，霍夫斯達特告訴訪問他的人說比爾德是「真正激發性的影響…他對我而言就像杜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對其他許多人一樣…那是比爾德激發我對美國史的熱情。」²³ 一九六二年他又寫道：「我的那一代都相信政治行為的基本動機力量是團體的經濟利益」。²⁴ 這自然是比爾德所一再強調的主張。即使他後來對比爾德，派靈頓與杜納等人以及整個進步史學有所批評，並

²⁰ Wise, *American Historical Explanation*, p. 100.

²¹ Richard Hofstadter, "Beard and the Constitution: the History of an Idea," 原載 *American Quarterly* II (Fall 1950), 後收在 A. S. Eisenstadt, ed., *The Craft of American History I*, pp. 149-168。所引意見，見 p. 156。

²² Richard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 Beard, Parrington* (New York, 1968), p. xiv.

²³ "Interview: Richard Hofstadter," *History* 140 (1960), p. 141.

²⁴ Richard Hofstadter, "Pseudo-Conservation, Revisited," in Daniel Bell, ed., *The Radical Thought* (New York, 1963), p. 98.

走出自己的路子，但他對比爾德的成就還仍是推崇備至。²⁵ 他甚至認比爾德與派靈頓等人是他「思想的義父」(adopted intellectual fathers)，而視對他們的批評為「弑親之舉」(parricidal forays)。²⁶

對比爾德這樣的推崇，他能不受其影響嗎？小斯萊辛格就指出霍夫斯達特雖曾接觸過馬克斯思想，也熟習馬克斯對歷史問題的取徑，但他是一位太明顯的比爾德的信徒(Beardian)，不會長期屈服於馬克斯思想體系之下。²⁷ 在這種情形下，那就無怪他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歷史著作所反映的史學思想，更接近比爾德的史學觀點，而不類馬克斯的階級革命論。

《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在一九四四年出版，但它撰寫卻是在一九四〇到一九四二年之間。這原是他的博士學位論文。它的主旨是敘述內戰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期間，社會達爾文主義在美國興衰的經過與原因。他指出社會達爾文主義在內戰後傳到美國立即被美國人普遍的接受，成為主宰美國思想的理念(ideology)。它盛行的根本原因在於自然選擇與優勝劣敗的觀念符合流行於美國以自由放任資本主義(laissez-faire capitalism)為核心的保守思潮。社會達爾文主義成為資本大亨與大作發財夢的中產階級用來消除反對，抗拒改革，維持現狀的利器。直到中產階級覺醒，對極端的放任與無限制的競爭喪失信心之後，達爾文主義的個人主義(Darwinist individualism)才在社會學者、經濟學者、政治學者以及哲學家的嚴厲批評之下逐漸消聲匿跡。但是在最後消失之前，它還闖了另一次大禍。它鼓動了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年流行的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與擴張主義。

從以上的摘述可知，在本書中霍夫斯達特不只追蹤了一個社

²⁵ 參考 Schlesinger, Jr., "Richard Hofstadter," in Cunliffe and Winks, eds., *Pastmasters*, p. 281; Hofstadter, "Charles A. Beard and the Constitution," in Eisenstadt, ed., *The Craft of American History*, I, p.157.

²⁶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p. xiv.

²⁷ Schlesinger, Jr., "Richard Hofstadter," in Cunliffe and Winks, eds., *Pastmasters*, p. 279.

會觀念的興衰演變，同時也敘述了內戰以後美國思潮由個人主義到集體主義(new collectivism)的轉變。但更重要的是從他的敘述分析討論中，我們可以窺見他的史學思想。而此時他的史學思想更接近進步史學，與後來著作所顯示的頗有不同。

首先，在本書中霍夫斯達特還未使用身份革命、迷思或符號等觀念為分析的工具。在以後的作品中，霍夫斯達特大致上都認為實狀與人們所認知的實狀中間有差異。人們對實狀的認知可能有誤，但卻是使人行動的基本原因。因此，他的研究多著眼於理念與實狀之間的關係。但是在《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中，他沒有採取這種研究取徑。他仍採取傳統的方法，將人們所持有的觀念當作實狀來研究。所以，這是一本實事求是直接了當的研究，沒有多繞圈子。這與進步史學家治學方式頗為近似，而與他自己後來的研究取徑或是其他諧和史家的研究取徑都頗有不同。

其次，在情感上，霍夫斯達特顯然比較偏好批判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人以及他們的主張。他指出在西班牙戰爭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間，一些學者如比爾德、范貝倫(Thorstein Veblen)、杜威(John Dewey)、卡門斯(John R. Commons)等人對個人主義式的社會達爾文主義(individualistic social Darwinism)展開猛烈的批評。從他們的批評中逐漸形成一種新集體主義，這些學者都將社會看作是一個集合的整體(a collective whole)，不再視之為獨立個體的雜湊在一起。在糾正社會缺陷方面，他們不再強調個人的努力而轉向由理性計畫所導引的集體社會行動(rationally planned collective social action)。他對此深表贊同。²⁸ 持此主張的人都得到他的讚揚。他稱他們為「新頭腦的批判天才」(the critical talents of new minds)。²⁹ 瓦德(Lester F. Ward)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批判被譽為「勇敢的拓荒之作」(a bold

²⁸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pp. 167-168.

²⁹ *Ibid.*, p. 168.

pioneering stroke)。³⁰ 杜威被讚為一位具有深刻社會意識的學者，他鼓吹智能(intelligence)作為改造世界工具的有效性。³¹ 霍夫斯達特對這些人以及對新集體主義的偏袒顯示他與這些人在社會立場上屬於同一陣線。事實上，在他寫這本書的時候，集體主義式的社會主義(collectivist socialism)對他具有極大的吸引力。³²

但是，最足以表現他的進步史學觀念的還是他強調理念的社會經濟基礎。他解釋說社會達爾文主義在美國流行的基本原因是當時美國社會的主導團體(dominant groups)——即中產階級——偏愛無限制的商業競爭與缺乏原則的政治活動。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主張正好為此赤裸裸的、人吃人的經濟社會競爭提供理論的基礎。所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存在完全依賴社會普遍接受無限競爭。但是，「純粹」的競爭並不穩定，因為無限的競爭必然為那些倒霉的或缺乏技術的人(the unlucky and unskilled)帶來不幸。當這些「不適者」(the unfit)人數增加時，社會不安隨之而來，受驚的中產階級從他們一度信奉的主張退縮，捨棄無限制的自由競爭。隨著中產階級的轉向，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批判首佔上風。最後社會達爾文主義終於從美國思想中消失。這是霍夫斯達特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在美國興衰原因的說明。在此說明中，他顯然認為關鍵在於社會主導階級的向背。而此向背又與社會經濟利益的變動密切相關。所以，他結論謂：

觀念有果也有因。但是達爾文式的個人主義的歷史是這個原則的一個清楚明白的例證：即社會觀念的結構須待經濟與政治生活發生普遍改變之後才會改變。在決定這樣的觀念是否被接受時，真理與邏輯是較不重要的判準(criteria)；較重要的判準是它們是否能符合社會利益的思想需要與先入之見(suitability to the intellectual needs and

³⁰ *Ibid.*, p. 84.

³¹ *Ibid.*, p. 135, 141.

³² Singal, "Beyond Consensus: Richard Hofstadter and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9 (Oct. 1984), p.982.

preconceptions of social interests)。³³

社會觀念隨社會經濟利益而變，經濟因果論至為明顯。而注重經濟因果論是進步史學的特點之一。另一個特點是強調階級或不同利益團體之間的對立衝突。³⁴ 在《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中霍夫斯達特並沒有特別指陳這一點。但是，他也曾說無限的自由競爭為倒臺的與無技術的競爭者帶來極大的不幸，這些不適者的增加與不滿造成改革運動的崛起。這種解釋明顯的暗示社會上有少數的「最適者」(the fittest)高高在上，少數的「不適者」低低在下，以及居中的多數的中產階級。而上下兩階級間有對立的存在。由此觀之，霍夫斯達特在一定的程度內也保留了進步史學的衝突論。

所以，由他自稱初學歷史時曾受比爾德等進步史家的影響觀之，由他在《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對觀念的處理方式，對人物與主張的好惡偏向，對經濟因果論的強調，以及對社會衝突的暗示等等觀之，霍夫斯達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史學思想更接近進步史學，更反映了比爾德的史學觀點。

但是，在第二本主要論著中，霍夫斯達特大大的修改了他的立場與觀點。他不但不再暗示衝突的存在，反而開始強調美國傳統的諧和性與不變性。霍夫斯達特已完全擺脫了進步史學的束縛，而走上他自己的思想途徑。

霍夫斯達特大約在一九四四年中開始撰寫《美國的政治傳統》。但是，他太太的生病與過世，照顧兒子，教書與再婚必然影響他的寫作進度。³⁵ 所以，這本書一直到一九四八年才出版。但一

³³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pp. 203-204.

³⁴ 衝突史觀是進步史學最主要的特徵。這是美國史學史家所一致共認的。中文的說明，請參考孫同勳，〈美國進步史學初探〉，《美國研究》，十二卷一期（民國七十一年三月），頁一～二六。

³⁵ Baker, *Radical Beginnings*.

出版就成為暢銷書，先後賣出百餘萬冊，被上千所大、中學校採用為教科書。由此可見它受到重視的情形。但說來奇怪，在本書中，霍夫斯達特對美國人素所敬重的領袖們批評多於讚揚。³⁶而且全書中缺乏內在的統一性。這本書其實只是自開國以來一些重要的美國領袖的傳記集。除第一章討論開國元勳與第七章討論十九世紀後半期的領袖人物為類傳外，其他各章都是一章討論一人，共計十人。除了菲立普(Wendell Philips)為激進的改革份子外，其他都是政治領袖。霍夫斯達特對這些人物都是實事求是的分析或描寫，處理的方法相當傳統。在敘言(Introduction)中霍夫斯達特說美國自立國以來即有一中心信仰，在討論各位領袖時，他將隨時注意此一中心信仰，並說明其對不同時期不同利益的適應。³⁷但在正文中，他卻甚少提到此一中心信仰，也沒有依此中心信仰來說明各位領袖的生平。實際上，只有在Andrew Jackson的傳中，他企圖使用「企盼的小資本家」(small expectant capitalists)的觀念來說明「傑克遜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的意義。³⁸這種重事實分析不重解釋的情形與他在敘言中所揭櫫的觀念頗不相合。因此，小斯萊辛格懷疑那篇敘言是事後加的。³⁹也由於同樣的理由，討論此書的學者大都偏重此敘言部份，因為在這裡他明確的表示了他的諧和史觀。

霍夫斯達特在敘言中說，由於研究美國政治領袖的理念(ideologies)，使他覺得需要從強調「普遍的美國輿論」(common climate of American opinion)的立場重新解釋美國的政治傳統。他指出這個輿論存在已久，但卻因過去過份重視歷史中的衝突而被掩蓋了。大家都只注意到美國政治中有一連串的兩個利益團體的對立衝

³⁶ Singal, "Beyond Consensus: Richard Hofstadter and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9 (Oct. 1984), pp. 983-984.

³⁷ Hofstadt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p. ix.

³⁸ *Ibid.*, chapter III, "Andrew Jackson and the Rise of Liberal Capitalism," pp. 45-67.

³⁹ Schlesinger, Jr., "Richard Hofstadter," in Cunliffe and Winks, eds., *Pastmasters*, p. 286.

突。但是這些衝突的激烈性常使人發生錯覺，因為兩大政黨黨員們所持的看法都受到財產與企業精神的影響。不管在具體問題上差異有多大，美國的主要政治傳統都重視財產權、經濟的個人主義，以及競爭的價值。他進一步解釋說：

私有財產權的神聖，個人處置或投資其財產的權利，機會價值，以及在寬廣的法律範圍內，自利與自立(self-interest and self-assertion)自然演進為一個慈善的社會秩序(a benevolent social order)，一直是美國政治理念(political ideology)中的主要信條。這些觀念大致上為這些很不相同的人，如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傑克遜(Andrew Jackson)，林肯(Abraham Lincoln)，克里夫蘭(Grover Cleveland)，布萊安(William Bryan)，威爾遜(Woodrow Wilson)與胡佛(Herbert Hoover)所共有。政治的責任...是保護此一競爭的世界，偶而培育它，補救偶有的濫用，但卻不是用集體行動的計畫去破壞它。美國的傳統也強烈的偏好平等主義式的民主，但是此一民主卻是貪慾的民主，不是友情的民主(a democracy in cupidity rather than a democracy of fraternity)。⁴⁰

霍夫斯達特相信美國不但有一個普被接受的政治理念，而且它從立國之初到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時都一直存在。他說雖然有人不斷主張美國需要一個新的世界觀來取代那個自立國以來美國人就孕育其中，強調自助、自由企業與競爭的理念，但直到羅斯福時仍沒有任何一個足可與之相比的新觀念被廣泛的接受。⁴¹在霍夫斯達特一九五五年出版的《改革的時代》(*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D.R.*)中，他辯稱自十九世紀末年以來改革傳統到羅斯福時即行中斷，但在《美國的政治傳統》中他似乎認為美國的中心信仰直到羅斯福時仍未被任何新信仰所取代。

美國何以會有這樣的諧和？它何以會繼續存在如此之久？霍夫斯達特的解釋是社會惰性有以使然。他指出自聯邦憲法訂定之後的整個美國歷史恰與近代工業資本主義的崛起與擴張相合，因此

⁴⁰ Hofstadt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p. viii, p. 286. 在討論Hoover 的信念時，也有類似的指陳。

⁴¹ *Ibid.*, p. vii.

美國很早就發展成一個生產力強物質繁榮的社會。任何一個具有良好的工作秩序(good working order)的社會都必有其潛在的機體一貫性(organic consistency)。爲了本身的安全，這樣的社會不會培育一些於其基本安排不利的觀念。這樣的觀念當然會出現，但是它們通常會被孤立起來，被限於少數的異議份子或疏離的知識份子，因此發生不了作用。至於其他大多數人因爲接受了這一套以競爭的資本主義爲核心的基本觀念，雖在競選時會有激烈的爭論發生，但選舉一過，仍能共同合作。在他的筆下，連美國兩大政黨的分野也變得模糊不清。

所以在《美國的政治傳統》中，霍夫斯達特完全捨棄了比爾德所強調的衝突史觀，⁴²轉而主張美國自立國以來就有一個資本主義式的自由主義(capitalistic liberalism)的中心信仰，而且這個信仰一直到羅斯福時都持續不變。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諧和史家。不過，後來霍夫斯達特對自己被認爲是一個諧和史家似乎頗爲不憚。有一位史家指出美國思想史中有一派學者否認在自由主義的政治家與保守主義的政治家之間有任何思想上的差異，並認爲在這些學者的著作中所有的政治家都被描寫成反動份子。當這位史家舉出霍夫斯達特爲此派學者的代表人物時，霍夫斯達特立即反駁說他「從來沒有持有這樣一個看法，也認爲它是絕不能成立的」。他說他的《美國的政治傳統》只不過是要證明「我們的政治家不論是自由的或保守的，彼此之間共有的東西要比政治爭論的激烈言辭所顯示的爲多」。⁴³實際上，他後來對諧和觀念的態度變得頗爲曖昧。譬如一九六八年時他說他對諧和觀念的態度「基本上是曖昧不清」。他雖然仍覺得從諧和歷史所獲致的精闢之見依然有用，但諧和觀念「卻已不像十年或二十年以前那樣令我覺得滿意」。⁴⁴即

⁴² Schlesinger, Jr., "Richard Hofstadter," in Cunliffe and Winks, eds., *Pastmasters*, p. 293.

⁴³ Hofstadter,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April, 1954, p. 328. 轉引自 Schlesinger, Jr., "Richard Hofstadter," in Cunliffe and Winks, eds., *Pastmasters*, p. 291.

⁴⁴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Note 3 on p. 444.

令他後來的態度有所改變，但在一九四八年時他毫無疑問的是一位諧和史家。他甚至還以首揭諧和觀念，而二十年後仍感沾沾自喜。⁴⁵

從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八年不過短短的四年時間，霍夫斯達特的史學思想何以會有如此巨大的轉變？當然，這可能是他感染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席捲美國的保守主義。⁴⁶ 但是這個解釋須加細論。不少學者都發現霍夫斯達特在《美國的政治傳統》中強調諧和與延續(*consensus and continuity*)，但是他的立場卻是批判的。如格林姆(Richard Gillam)就說此書的格調是「深刻的批判的」(*acutely critical*)。⁴⁷ 小斯萊辛格認為霍夫斯達特是從一個激進的立場發現諧和的存在。⁴⁸ 而霍夫斯達特自己根據恩格(Irwin Unger)在一篇討論新左派史學的論文中提到有些新左派史家也採用諧和的觀念⁴⁹的說法，宣稱他自己在一九四八年主張諧和是出於「一九三〇年代的馬克斯主義」。⁵⁰ 由此看來，他似乎沒有受到保守風潮的影響。但實際情形恐非如此。從消極方面言，以上所言他的批判與激進並非不可反駁。霍夫斯達特自稱他是從馬克斯主義來揭發諧和的說法是一九六〇年代新左派思想正盛時加上去的，不足以說明一九四八年他當時的心情與想法。至於說霍夫斯達特在書中有不少批評；但同樣的也可以找到許多讚揚的例子。單用於褒貶來定他的立場

⁴⁵ 請讀這句話：“I suppose the first statement, however brief and inarticulate, of the consensus idea in this period was in my Introduction to my book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1948). . . .” *Ibid.*, Note 3 on p. 444.

⁴⁶ 美國新保守主義崛起的背景，參考孫同勳，〈美國的新保守史學〉，《美國研究》，十二卷三期（民國七十一年九月），頁三～八。

⁴⁷ Richard Gillam, “Richard Hofstadter, C. Wright Mills, and ‘the Critical Ideal,’” *American Scholar* 47 (1977-78), pp. 76-77.

⁴⁸ Schlesinger, Jr., “Richard Hofstadter,” in Cunliffe and Winks, eds., *Pastmasters*, p. 289.

⁴⁹ 這篇文章是“The ‘New Left’ and America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2 (1967), pp. 1251-1253.

⁵⁰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Note 9 on p. 452.

顯然難得令人信服的結論。從積極方面而論，首先他對保守主義並不全是反感。他指出新保守主義也為歷史寫作帶來一個「新調」(new note)。⁵¹ 其次，有證據證明他多少也感染了戰後的新保守風氣。他曾說明他為什麼批評比爾德等進步史學家的原因。他說進步史學是應進步改革運動而起，有其時代背景。但時移勢轉，它已不能符合他自己那個時代的所需。他指出「我們這些在大不景氣(the Great Depression)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長大成人的人不能再像進步史學家們那樣單純的信仰美國自由主義的自足性(sufficiency)。我們發現我們生活在一個更複雜更可怕的世界中」。⁵² 他進一步解釋說，歐洲的崩潰，戰爭與死亡集中營的殘酷，使美國人對歐洲的社會與政治大起反感，使他們重新肯定美國的傳統。繼起的冷戰更進一步加強美國人的團結、對共同目標的強調、以及對馬克斯階級衝突主張的反感。甚至對原子彈的恐懼也造成保守的傾向。⁵³ 他在這裡所述的既是他那一代的共同感受，也是他自己的感受。他人既因此而趨向保守，他何能獨免？因此，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短時間內曾感染到崛起中的保守風氣，是極為可能的事。但是他早年的激進傾向與比爾德的影響一時難以盡去，所以在《美國的政治傳統》中，還會偶有現顯。當然這一點也可以解釋小斯萊辛格的懷疑，即霍夫斯達特在敘言中與在本文中的立場並不完全一致。如前所言，霍夫斯達特早在一九四四年就已開始撰寫此書的若干章節，但直到一九四八年才出版。如敘言是在付印時才寫的，則敘言與本文立場的不一致很可能是因為他在寫敘言時才受到保守思潮的影響。這與保守思潮的崛起在時間上是完全吻合的。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也可說明他的思想的轉變。那就是史學思想本身的改變。霍夫斯達特曾謂進步史家們將衝突論最後使用

⁵¹ 見 Schlesinger, Jr., "Richard Hofstadter," in Cunliffe and Winks, eds. *Pastmasters*, p. 291.

⁵²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p. xv.

⁵³ *Ibid.*, pp. 438-439.

過濫，推到極限，除重複陳腔濫調之外，已無路可走。繼起的史學家只有另闢蹊徑。反動的結果必然是降低衝突在美國史上的重要性。⁵⁴ 霍夫斯達特在學生時期必然已有這種覺醒，所以才對杜納，派靈頓，甚至比爾德等人的主張有所批評或修改。⁵⁵ 但其時他尚在學習階段，思想尚不成熟獨立，及至進入哥倫比亞大學修讀博士學位時，他又受教於寇堤，並在他的指導下寫成他的博士論文。所以，《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主義》中仍能清楚的看到進步史學的影子。但當他畢業後(1942年5月)，先在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教書(1942-1946)，後返回母校任教(1946)，他已是一位獨立的學者，不僅思想已經成熟，而且正逢保守思潮崛起之時，所以他很自然的跳出進步史學的框架，而在《美國的政治傳統》中提出他自己的諧和史觀了。

霍夫斯達特被公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史家之一。當他於一九七〇年以五十四歲的壯年因癌症去世時，被認為是美國史學界不可彌補的損失。他的主要史著無一不受到史學界的重視。但是他的意見或主張也經常引起爭論。霍夫斯達特的主要研究活動大約在一九四〇年代到一九七〇年代這三十年間。在此期間無論美國或美國的史學都曾經歷巨變。他作為一個敏感的知識份子，不可能自外於這些巨變，而不受任何的影響。所以，在他企圖了解觀念與政治之間關係的歷程中，我們看到他從進步史學走向諧和史學，然後又走向對迷思、符號與身份的研究。他是一位多產的史學家；也是一位善變的史學家。也許善變使人難以確切的了解他的真意，因而產生爭論。也許史學研究的主觀性根本使意見永難一致。如果是後一個原因，有關霍夫斯達特的爭論恐將繼續下去。本文所論，只不過是這個爭論中的一偏之見而已。

⁵⁴ *Ibid.*, p. 439.

⁵⁵ 他早年對這幾位史學家的批評，見Schlesinger, Jr., "Richard Hofstadter," in Cunliffe and Winks, eds., *Pastmasters*, pp. 281-283.

The Change of the Historical Thought of Richard Hofstadter

Tung-Hsun Sun

Abstract

Richard Hofstadter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merican historians of the post-WWII generation. He has also been a controversial schola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have argued over whether he should be classified as a Progressive or Consensus historian.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after careful analysis of his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1944) an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1948) and his own confessions,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controversy probably arises from the fact that Hofstadter's historical thought underwent a profound change from Progressivism to Consensus during the 1940's.